

新女性情慾

女性情慾不要「政治正確」

何春蕤

「妖言」是一系列女性情慾的自白式小說，是很多女人寫作其虛構或實際的性經驗的一個運動。「妖言」出現之後，很多人說他們看不出「妖言」有什麼「妖」的，他們說「妖言」不過是一些色情故事而已。甚至在《島嶼邊緣》登出那篇〈我和老師在研究室做愛〉之後，還有一位讀者投書，指責那篇故事沒什麼特別的顛覆力量，這位讀者認為在故事中看來還是由男老師「指導」女學生如何欣賞自己的性器官的氣味，還是由男老師來主導做愛的情景，還是由男老師來引領女學生享受身體之樂，等等。

我覺得這類反應其實顯示的是，大家對於性、對於情慾、對於愉悅，還是用一些固著的框架，某種單一的標準來衡量，像這位讀者就好像在暗示，大概只有某種做愛的互動模式才是最「政治正確」的，是最合乎女性主義立場的。換句話說，有人會以為女性主義者如果和男人做愛，大概一定要女上男下，女主男從，女方說「勃起」，男方才能勃起之類的，或者女方要全

面操控局勢，主掌性活動的整個流程才叫做「肯定女人的主體性」。也有人堅持，「妖言」應該有某種觀點，某種立場，某種內容才算有「解放」的份量。

如果你的性幻想或快感模式、角色扮演是在刀下被父兄輪暴、綑綁、鞭打、羞辱、虐待、恐嚇，或是被迫在他人面前表演脫衣舞或者去當妓女等等，那麼你就是「政治不正確」？如果你寫出這段幻想來，你的「妖言」因此就是「男性觀點」？

當然不是。讀過 Nancy Friday 的《女人的秘密花園》的人就知道有許多女人有這樣的性幻想，而且可以藉它們達到高度的愉悅。這些幻想和現實生活中個人的人格或政治立場沒有關連，我們不能由一個人的性幻想來推論她的女性主義立場，正如我們不能由一個人夢到拾金不昧而推斷他是個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或者由一個人夢到父親死亡而推斷他不孝。

性幻想和夢一般，是人的無意識的運作產物，值得分析，但絕不可加以表面的、膚淺的道德或意識形態批判。因為情慾模式中的口味偏好，和現實生活中的主體人格與互動模式之間，並無絕對的關聯；我們不能由女人在性

幻想中偏好被動的情結，來推斷她在現實生活中也必然缺乏獨立自主的人格，反過來說，一個有自覺意識、獨立自主人格的女性主義者，也有可能透過在情慾幻想及性模式中被貶低物化而得到快感。情慾幻想的世界並沒有大道直通現實中的權力關係。

數千年來，父權對女性情慾的壓制呈現為禁止女人在情慾上主動積極地追求享受，連說情慾或者想情慾都被冠上不道德的污名，以至於女人很難獲得愉悅，現階段的性政治所追求的解放，針對的正是這種現實生活中對女性的主動能力的打壓，情慾人權的剝奪。至於女人在享受情慾的時候，需要何種「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性幻想，採取何種「主動或被動」的性活動模式，那是個人的口味選擇，但至少女人要擁有主動選擇，積極享受這些幻想及模式的權利。至於「規範」、「統一」、「正確」等等極可能壓抑情慾並產生焦慮的說法，它們並非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關切。

而「妖言」的多樣性正是對那種追求規範、追求正確的衝動提出挑戰。「妖言」的「妖」，正在於它溢出了父權原本對女性情慾的單一規範，它自己在地聚焦於女性愉悅快感的各種狂野故事和幻想，而在這個想像與經驗互溶

互滲的園地中，多元多樣的可能，才構成自在自得的物質基礎，並以此衝破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單一規範。

正因為這樣，「妖言」的「妖」不但不甩父權的道德標準，也無懼於「政治正確」意識型態檢查。

「妖言」的多樣性更進一步展示，性的愉悅本來便是在個人成長經驗中因著某些偶然的際遇和累積形成的。快感的獨特性和個人的口味本來便有各種差異的、複雜的來源，絕不是可以輕易化約為某個政治立場或道德人格的，而「妖言」的多樣正是對個人愉悅模式的充分尊重與愛慕。

妖言呈現的，就是一個多元多音的情慾世界，只要不歸於單一，遊戲的內容和方式是沒有什麼禁忌，沒有什麼道德也沒什麼底線的。不同的伴侶、異性同性、不同的關係、動物……什麼都可以玩，都好玩；同樣，也不會有什麼是「特別好玩」、「特別正確」的。

妖言才剛剛出來，就有人要拿意識型態檢查她夠不夠妖，夠不夠政治正確，是不是「女性觀點」，這對寫妖言、講妖言的女人來說，是一種新的壓抑。

在情慾操練的過程中不該有壓抑，也沒什麼對錯，我們要開拓一片更廣的天空來發展自己的情慾。只有在這樣的情境與空間中，女人才不會在情慾一發動時就馬上自我檢查，自我責備。「我這樣對不對」要開始從女人的腦筋裡除去，因為到目前為止，女人只問自己對不對，從不問自己爽不爽，也沒想過愉悅不愉悅。自在自得的身體愉悅是父權一向不允許女人享有的。

因此，說妖言，是女人肯定自我的身體情慾，肯定自我的主權和主體力量的起碼活動。在女人難爽，情慾資源和經驗都過度缺乏的情況之下，說妖言、談妖言更是使女人得力壯大的重要途徑之一。初初起步，妖言運動尚未擴散成功，家妖女仍須積極開口提筆，廣為傳播。

(1995年1月婦女新知152期)